

宋词

管窥

SONG CI GUANKUI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宋词管窥/高明泉著.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4.7

ISBN 7 - 227 - 02775 - 9

I. 宋… II. 高… III. 宋词 - 文学研究

IV. I20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66845 号

宋词管窥

高明泉 著

责任编辑	哈若蕙 贺秀红
封面设计	吴海燕
内文版式	王 芳
责任印制	来学军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网 址	www.nx - cb.com
电子信箱	nrs@public.yc.nx.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宁夏美利科技印刷纸品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8.5
字 数	180 千
版 次	2000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2150 册
书 号	ISBN 7 - 227 - 02775 - 9/1·718
定 价	22.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宋词管窥》内容简介

《宋词管窥》是一部关于宋词研究的专著。全书共由五个部分组成：

一、通论篇 由《姜白石与清雅词派》、《闲逸词派概述》、《婉约词“断肠”“销魂”主题论》、《情词中的婚外恋情》、《宋代女词人创作简述》等组成。一是对婉约、豪放词派之外的词，界定为“清雅词派”“隐逸词派”，进行简要综述钩沉，归纳出两个词派的风格特征。二是对婉约词的“断肠”“销魂”主题、宋代情词中的婚外恋情及宋代女性词人创作的专题研究。

二、作家篇 由《柳永词的人生意蕴》、《柳永对宋词的贡献》、《苏轼豪放词风成因》、《苏轼词与他的思想》、《贺铸及其词》、《集大成的词人周邦彦》、《辛弃疾词的忧患意识》、《辛弃疾词的用典手法》、《辛弃疾词的情感表达方式》、《高观国及其词》等组成。这部分是对宋代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进行的专题研究，从作家思想对创作的影响进行分析，侧重于对词所表现出的人情、人性与人生意蕴等方面进行研究，探讨宋词的社会价值、时代特征和人文精神由三篇文章组成。在宋词研究中具有一定的独特见解。

三、风格篇 由《柳永与李清照词比较》、《秦观词的情调》、《苏轼与辛弃疾词风》、《晏几道词的艺术特色》、《“易安体”的基本特征》、《李清照词愁情美》、《姜白石词的美学境界》等组成。一是通过对这些词人的艺术风格进行全面的分析，概括出其艺术特色和风格特征。二是对词人生

平、创作、风格方面进行比较研究，分析他们不同的创作特点与风格特征。

四、附录一 由《李清照词的〈词论〉》、《张炎的〈词源〉》两篇文章组成，比较详细地介绍了李清照的《词论》和张炎的《词源》两部词学论著，理清其词学理论的主张及其对后世词的创作与词学研究的影响。

五、附录二 宋词名作解读。通过对词作的背景、缘由和词人创作心理过程的解读，对名家名作进行分析、解读和鉴赏，给宋词爱好者提供一定的参考资料。

目 录

■ 序	001
■ 导 论	
■ 宋词的发展与流变	005
■ 可 论 篇	
■ 姜白石与清雅词派	019
■ 闲逸词派概述	026
■ 婉约词“断肠”“销魂”主题论	034
■ 情词中的婚外恋情	046
■ 宋代女词人创作简述	054
■ 作 家 篇	
■ 柳永词的人生意蕴	063
■ 柳永对宋词的贡献	071
■ 苏轼豪放词风成因	079
■ 苏轼词与他的思想	087
■ 贺铸及其词	095
■ 集大成的词人——周邦彦	105
■ 辛弃疾词的忧患意识	121
■ 辛弃疾词的用典手法	131
■ 辛弃疾词的情感表达方式	137
■ 高观国及其词	147
■ 风 格 篇	
■ 柳永与李清照词比较	158

■ 秦观词的情调	165
■ 苏轼与辛弃疾词风之异	175
■ 晏几道词的艺术特色	182
■ “易安体”的基本特征	189
■ 李清照词的愁情美	199
■ 姜白石词的美学境界	209
④ ①	
■ 李清照的《词论》	216
■ 张炎的《词源》	224
④ ②	
■ 宋词名作解读	228
王安石	229
桂枝香·金陵怀古（登临送目）解读	
苏 轼	232
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解读	
贺 铸	236
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解读	
姜 夔	239
暗香（旧时月色）解读	
姜 夔	244
疏影（苔枝缀玉）解读	
辛弃疾	248
青玉案·元夕（东风夜放花千树）解读	
文天祥	252
念奴娇·驿中言别友人（水天空阔）解读	
④ ③	
	257



序

高君明泉在高校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二十五年，特别是对宋词这一治学的重心，倾注了巨大精力，这本《宋词管窥》就是他研究成果的结集。

宋词研究极难，不仅需要研究者具备一定的学识，更需要有一定的才性，读过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者会以为我的说法有一定道理。宋词很讨文人学者的喜好，所以涉足于古代文学研究领域者，多视先秦两汉文学为畏途，而视唐宋文学为热门，乐此不疲。爱好与研究毕竟有所差别。爱好仅能窥其门墙，研究者则必须登其堂奥。高君对宋词的研究有独到之识，深沉之思，吐而为心得之辞，风发泉涌而成文。我感到其文虽醇驳不同，奇正不一，但能借鉴先贤之研究成果，再抒己见，因而有新意与创见。

宋代文人（士）“出入佛老”而复“返之六经”。他们是从六朝隋唐的宗教中翻身过来的人。在他们那里，超越世界的“道”和现实世界的“食色”生活是不可分割的人生两面，或者说是一种不离不即的关系。他们的理想世界在人间而不在天上。尽管他们也在高唱“天人欲”、“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调头，但他们毕竟不是宗教禁欲者，不能脱离食色，在实际生活中他们又是“先天下之乐而乐”的享乐者。宗教信仰（包括禁欲主义）在宋代士大夫人生中不占主导地位。中国文化没有经过一个彻底的宗教文化历史阶段，儒家思想即士大夫们所守的“道”始终居于主体的地位，“明道救世”却不离人伦日用。反映到文学创作中，从《诗经》开始，“言志”与“缘情”是统一的，其精华部分则是国风中谈情说爱的内容，反被道学究说成“淫奔之诗”。

宋代文化上的“俗世化”，使文人把创作精神由正统诗文转移到民间说唱性质的词曲一类市民文学方面，以艳情为主要内容，从五代到北宋，词为“艳料”是其主流；至南宋，由于社会民族危机严重，词中才出现关于国家命运的所谓“爱国”的“重大题材”。“俗世化”是宋词兴起的重要的文化背景，研究宋词不可忽略这种文化背景。

余英时说：“从中国历史上看，有些‘士’少年放荡不羁，而暮

年大节凛然；有的是早年慷慨，而晚节颓唐，更多的是生平无奇节可纪，但在政治或社会危机的时刻，良知呈露，每发为不平之鸣。”（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引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页）从宋词作者来看，词反映了他们的精神生活与日常生活，他们的“食色”物欲生活中，不乏“放荡”的一面，也有在政治或社会危机的时刻，良知呈露，每发为不平之鸣即“明道救世”的一面。研究宋词，不能只看到他们“慷慨”的一面，而忽视或否定他们“放荡”的一面，否则等于歪曲了宋代文学史的真实。放荡与慷慨在宋代词人身上往往是相统一的。应该承认，宋词中“放荡”的内容也是一种美。

宋词的主要成就和价值在婉约派而不在豪放派。宋代婉约词突破了“思无邪”的夫子之道，不“立于礼”而专于情，大胆地描写男女私情，表现士大夫与歌伎、妓女的恋情，这是唐诗所不能比拟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尊奉礼教之规范，以“理”夺“情”。而宋词写恋情、写婚外恋情具有反对封建礼教的巨大意义。考察宋代士大夫在理学上讲“存天理，灭人欲”，在词的创作中却又放纵人欲。其实陈确说得明白：“人欲恰到好处即天理”。这正应了六朝萧纲说的“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慎，文章且须放荡。”（萧纲《与当阳公大心书》）鲁迅却很称赞萧纲的话，他在《书范折枝》一文中云：“而谓作文‘且须放荡’，非有大把握，那能尔耶？后世小器文人，不敢说出，不敢想到。”宋代婉约派词人柳永就是“小器”的文人，但他既敢说出，也敢想到，并以词的形式写出来，让人去欣赏。

“词主艳科”。宋代一流的文学家没有一个不在这一“艳科”内施展自己的才华，寄托自己的“艳”情，把自己情感世界里最真实的东西拿出来的。从宋词的发展历史来看，苏轼确是北宋词风变化的标志性人物，但豪放派的出现与发展并没有取代或压倒婉约派，苏轼并没有也不可能取代李清照、柳永的地位。对宋词研究，研究者们多看重苏、辛豪放派的价值而忽视婉约派词，相对说来婉约派词的研究仍是个薄弱环节。高君明泉恰是在婉约派词的研究上有所成就。集中涉及情爱内容的有多篇，其中较有价值的是《婉约词“断肠”“销魂”主题论》、《情词中的婚外恋

情》、《宋代女词人创作简述》等篇。高君之论正好揭示出了宋词情本体的特征。朱熹说：“性之所感于物而动，则谓之情”。孟子同时代的老子早就说过：“食、色，性也”。所以“性之征于欲，声色臭味而爱畏分，既有欲矣，于是乎有情”（戴震）。“情”是审美创造的根源：“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宋代的理学家表面以“天理”代“人欲”，而暗中往往养着“小蜜”。而宋代词人却验证了孔子说的“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论语·子罕》）的话。“德”属于“善”；“色”属于“真”、“美”。“德”是对人性的矫饰，“色”是人性的自然化。宋代的情词相当深刻地揭示出了人这种天性。高君研究宋词抓住男女关系中情爱这一根本，揭示出宋词的审美倾向性和私情本体的本质特征，对传统观念有一定突破。高君说：“词在表现爱情意识方面，较之诗中占有更大优势。词作为一种合乐应歌的新的文学样式，它的创作场所往往是舞会和酒席宴异性在场的环境，对爱情意识的勃发无疑是一种刺激。词往往交由歌伎舞女演唱，当然较适合于香艳的题材。词还有一个优势，即词的地位低下，当时词不被看成是正统文学，人们可以大胆、直言去表现所谓的‘黄’、‘艳’、‘色’的内容，又不造成有伤大雅的影响。”（《情词中的婚外恋情》）高君说出了宋词的一个最本质的特点。如果说宋词在大量地写爱情，不如说是在写“性爱”。正如高君说的那样，“宋代情词的创作，几乎可以说是清一色的婚外恋情。”豪放派的词人也写了大量的情词，而且大多描写的是婚外恋情。在《宋代女词人创作简述》中高君告诉我们，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性爱女神在宋词中又复活了。

我们细读宋代男女词人的恋情词，会想起美国当代女权主义者卡米拉·帕格利亚，她认为女性是隐秘的、神秘的，男性则是外放的、投射的。在男女两性中，女人更能与自然力浑然一体，都有一种天然的内在完善，在生理、性、精神等方面，都处于自足状态。中国的《周易》中，乾坤二卦即为天地阴阳男女的指称。阴阳男女的对等关系构成自然人生和谐的整体，就像道家太极图所昭示的阴阳两条鱼那样，互为联系，和谐一体。《易·系辞下》：“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成物化生。”这对我们理解宋词中的恋情、婚外恋、“断肠”、“销魂”主题论有理论上的指导意义。当然人不是单纯的自

然物，人是自然与文化的组合物。宋词中的情词更具有文化品质和文化创造能力的文化存在物的意义。宋词中男女两性关系中的恋情、性爱，超越了单纯的动物式的自然状态，是按照审美的人生方式，按照人的文化性“化”出的艺术形象。婉约派的男性代表人物柳永词所表达的是，“正因为不完美才去寻求自我补救”而“将在自己身体上受到阻碍的自然力向外（女性）投射释放”的内容。而婉约派的女性代表人物李清照的词，则幽柔地表达了女性特有的隐秘、神秘的性爱。她与赵明诚的结合是一种天然、内在的人性化完善。李清照爱赵明诚，绝不是按照封建礼教规范的“丈夫”，而是当作“情人”。李清照词之所以能对男性、女性心灵产生巨大的震撼力、吸引力，使他们神魂颠倒，首先在于她是中国的性爱女神——“中国式的维纳斯”在性爱追求上的那种主动和独立精神，其次才是她的诗人气质。以柳永和李清照为代表的婉约派的香艳词，是对男女两性的感官情欲和肉体形象所展现出的“自然力”的“美”加以张扬，是对人性美、女性美和自然美的勇敢讴歌和鉴赏。高君明泉在宋词中以睿智的眼光看到这种人性美，进行研究，这是值得肯定的，也是当代宋词研究中很值得重视与充分肯定的学术成果。

高君是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固原师专中文系的。我与高君是同道者，在固原师专中文系共事十个春秋，1988年秋我调至山东青岛大学工作，但与明泉君一直保持着联系。别后的十六年，我已垂垂老矣。年初接到高君寄来的《宋词管窥》书稿，请我作序，我“始旋其面目”，有所感焉。原来高君声影隐于学问，“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孟子·离娄下》）高君青年时勤奋好学，中年后潜心教学与研究，而亦欲“立言”，终有所得。现在《宋词管窥》出版问世，我亦欣喜，故为之序。

袁伯诚

2004年2月8日

于青岛京山东麓蛮触氏之斋

宋词的发展与流变

经过隋唐五代近四百年的民间作者和文人作家的共同努力，到宋代，词这种新诗体才逐渐发展成熟起来，

“由一泓清浅，演为初具波澜，进而成为溶溶流川”^①。到了两宋，词成为文学正宗，上至帝王将相，下及寻常百姓，雅则文人士子，俗则里巷市民，无不填词吟词。词的创作队伍日益壮大，词的创作题材丰富，作家视野扩大，技巧提高新变，使词由成熟而达到了空前的丰收。据《全唐五代词》载，仅有词家一百七十余家，收词二千五百余首。唐圭璋所主编的《全宋词》，收词家一千三百三十一人，收词一万九千九百余首。孔凡礼《全宋词补辑》收作家一千四百三十人，收词二万零八百余首。两者总计收录作家二千七百六十余人，收词作品四万余首，可以说，宋词作品卷帙浩繁，灿若星斗。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画廊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是中华民族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优秀的文学遗产和宝贵的精神财富。

宋词的发展与流变，是与宋代社会的历史发展与变革互相适应的，并且是同步发展的。宋词的发展与流变，可依南北两宋的历史时期，具体划分为六个阶段。

第一阶段 北宋前期

这个时期主要是继承晚唐五代余风，为宋代词的过渡时期。由于北宋前期近百年的升平，适应统治阶级娱宾遣兴的需要，晚唐五代婉丽的词风弥漫一时，“词主艳科，香而软媚”。当时出现的第一个词人群有柳永、范仲淹、晏殊、欧阳修、宋祁、张先等。这些人主要生活于真宗、仁宗两朝的太平时期，自然形成了适应现实需要的词风，“逮至本朝，礼乐文武大备，又涵养百余年，始有柳屯田永，变旧声作新声”^②。这时期词的内容不外乎男欢女爱，伤情别离，风花雪月之类。因为这些人除柳永、张先之外，其他词人都是社会政治地位显达的台阁重臣，特别是晏殊、范仲淹、欧阳修等位及人臣，官至宰相，仕途宦达，命运顺利。他们的词所反映的内容主要是“百年无事”的承平时代的宴飨酬答唱和之生活，以及人生仕途中乐极而悲的人生感伤和思考。

欧阳修与晏殊身为太平宰相，生活优裕，在日常的政务之余，便以宴饮为乐，以填词为趣。二人喜爱南唐冯延巳词，而又无冯延巳的经历和感慨。其所作词，或“风流蕴藉”、“温润秀洁”而多带富贵之气；或“疏隽”、“深婉而有鄙褻”之语，与西蜀“花间”有许多共同处。“晏元献虽早富贵，而奉养极约，惟喜宾客，未尝一日不燕饮。而盘饌皆不预办，客至旋营之。……亦必以歌乐相佑，谈笑杂出。……乃具笔札，相与赋诗，率以为常。前辈风流，未有比也。”^③“欧晏”词中偶也有些闲愁闲绪，以词“呈艺”，表现自己的艺术才情。但是“欧晏”在宋词的发展历史上，有其创造性的贡献。“他们以众多的艺术圆熟，意境浑成的典范之作，强化了温庭筠等花间词人开创定型的抒情范式，进一步确立了以小令为主的文本体式，以柔情为主的题材取向和以柔软婉丽为美的审美规范”^④。晏殊在词的题材、艺术上亦有创新。他将词的镜头由青楼歌伎、红粉佳人转移到了乡村阡陌的“采桑径里”，如《破阵子》（燕子来时新社）。描绘人物、风景传神清新，给词坛带来了一股令人心脾一新的新鲜

气息。欧阳修是“四纪才名天下重”的元老勋臣，被称为笔下“挥毫万字”的“文章太守”。他的《醉翁琴趣外编》中，大量的词是对饮食男女离情别恨的描写，如“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笑问双鸳鸯字怎生书？”之类。但他更有一些表现仕途坎坷，人生风浪的词，如《圣无忧》（世路风波险，十年一别须臾），《朝中措》（行乐直须年少，尊前看取衰翁）。在词中表露不屈而愤懑的心情，流露回首往事的无限感慨。还有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组词的出现，其艺术视野向塞外沙场扩展，“白发将军”与守边士卒都成为词中的主体形象，在词史上有开创性。这些男子汉、大丈夫形象活跃于词中，表现出了男性气概在词中的光芒，也给词的世界带来了新的精神。

如果说前面所说的词人属于雅词代表的话，那么柳永则是属于宋初俗词的代表词人。他自称“奉旨填词”，创作慢词。柳永在宋代词的革新上可以说是有扛鼎之功，亦有创新之功。一是有创体之功；二是有创意之功；三是有创法之功。柳永大力创作慢词，扩大词的体制，增加了词的含量，提高了词的表现力。这是因为柳永感到令词体制小，不足以表达丰富深刻的感情，而以铺陈赋排笔法写作曲调舒缓柔慢的新词，为歌伎舞女巧为新声，从而博得“俗望”，故而“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可见柳永词的影响之大。柳永的词打破了前代词中普泛、类型、传统的情感世界的束缚，使其词中有自我形象、个体意识的表现色彩，并且把词作为人生、人情、人性的意蕴的“乐章”去谱写；柳永沿着李煜开启的方向，注意把词的抒情取向转移到自我独特的人生体验上来，表现自我的情感心态，喜怒哀乐。他的羁旅行役词如《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就是他在人生仕途上沉浮挣扎的种种苦闷的真实记录。柳永在宋词表现手法上的创新，除铺叙渲染之外，还注重运用比兴手法、白描手法，“物色传情”，“借物写情”，使词的创作具有叙事性与情节性的结合特色，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基础，从而为推动北宋词的发展起了奠基作用。

第二阶段 北宋中期

北宋中期，是北宋政治变革的重要时期，朝廷政局变幻，党争激烈，特别是新旧党争，延续到整个北宋。神宗时期（1068-1085），新党执政，反对变法的旧党人士大多被排斥出朝，元祐年间（1086-1093），高后听政，起用旧党，力斥新党。这时属于旧党的苏轼及苏门诸子回朝，会于京师，酬唱诗词，文坛空前兴盛。这一时期在词坛上形成的词人群以苏轼为代表，有秦观、黄庭坚、晁补之、张耒、贺铸，还有王安石、李之仪、陈师道、赵畴令等。从而，促进宋词出现了多种风格竞相发展的繁荣局面。这些词人大大都是词坛上负有盛名而在政治上怀才不遇的失意士大夫文人。他们一方面更多地体验了官场的险恶刀剑，另一方面也更多地体验到了命运的坎坷、人生的失意、仕途的艰难。实际上他们的词创作表现的主要是生存的危机与忧患、人生的失意与苦闷。

这一时期，被称为是北宋词坛上“异军突起”的时期。首先是以苏轼为领袖的苏门词人群体。有“苏门四学士”黄庭坚、晁补之、秦观、张耒，“苏门六君子”黄庭坚、晁补之、秦观、张耒、陈师道、陈与义。

北宋前期的文坛主将欧阳修去世后，被欧阳修奖掖培养的苏轼，继承师道而执掌文坛。苏轼是宋代杰出的诗人，古文运动的领袖之一，也是一位填词的革新者。他以其才学，不为音律所束缚，以挥洒的笔墨通过词来言志抒怀，继柳永之后更加扩大了词的题材，提高了词的地位，开拓了词的新境界。宋人王灼评论说：“偶尔作词，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胡寅评论说：“苏词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婉转之度，使人登高临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埃之外。”宋末刘辰翁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他给词带来的“天地奇观”，就是把抗敌御侮等社会题材引入词中，这是词坛上前所未有的创新，从而创立了宋代的豪放词派。他创造的

东坡范式，即：“主体意识的强化；感事性的强化；力度美的转化；音乐性的突破。”^⑤他的豪放，主要表现在冲破“词为艳科”的樊篱，使词的题材达到空前的广阔，凡是诗歌能表现的内容题材他都用来写词，而且笔力雄健，气象恢宏，意境高远，如“大江东去”，似“高坡走骏”，晁补之评论说：“居士词，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他的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歌大江东去”。如果让乐将军奏之，则必然会使江波震怒。在苏轼的旗帜下，有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等人，学其词风，但他们却没有完全离开宋初词的轨迹。

在苏门词人之外，还有晏几道、贺铸等人，他们“各尽其力，自成一家”。“小晏”以小令的创作最为出色，在词中表现一个纯真无邪的恋情世界。陈廷焯称他“工于言情”，又批评他“情溢于词外，未能意蕴言中”。他“追求词的气象，在情景交融中写出空灵的意境，表现心灵的奥秘”。^⑥他追求感情的真诚袒露，往往用白描等手法，直写胸中之真情，给人更多的是情绪的感染，引起读者心灵的震颤。而贺铸也是苏轼之后较有创新的词人，是一个极有“丈夫气”的人物，其词抒怀、述志、咏史、咏物、悼亡皆有，内容丰富，风格多样。但主要是写艳情词“繁花梦断酒醒来，扫地春空，”亦不脱宋初词风窠臼。

第三阶段 北宋后期

北宋后期，词坛上出现了以周邦彦为首的“大晟词人”。周邦彦是一位兼采众长，创调定型的大词人，促进了词体的成熟，被后人尊为词的“集大成者”。他是一位精通音律的音乐家、学者型词人。“大晟府”是宋徽宗设立的宫廷音乐机构，创建于1105年。周邦彦1116年成为大晟府提举官，主持大晟府，收集、考证、审定、创制词谱、词律，对宋词起到了规范化、格律化的作用，确有集大成的功劳。周邦彦以御用文人的姿态出现，与北宋新旧两党均不依附，故而没有受到党争

的牵连。他的任务是每月向皇上献诗词一首，以博得主子欢心。因而其词注重音律，注重用事用典。他经常过着偎红依翠的生活，多写男女情爱的艳词，亦作点缀升平的应制词。他美貌多才，曾是汴京名妓李师师的狎客，自然有不少风流韵事，甚而有与徽宗皇帝争风吃醋之事，作《少年游》（并刀如水，吴盐胜雪）词被传为笑谈。他不过是把寻花问柳的荒淫生活美化，流露出色情的高低调来，“不过是人面桃花，旧典翻新耳”。但这种词被士大夫文人推崇称之为“词家之冠”，“言情体物，穷极工巧”，正是投合了封建官僚及士大夫的爱好的表现。

周邦彦作为大晟词人群的领袖，他在词的创作理论上有很高的建树，一是提出了词的“平仄”与“四声”变化之说，要求严格依词律词调作词。二是注重词的章法结构与句法炼字，注重用事用典，强调作词亦要“无一字无来处”，显示其才学功力，又表现词的典雅精巧。三是使恋情词新变，即将恋情词雅化和自我化，使恋情词中的女性中心型变为男性中心型；将恋情词写得比较含蓄、高雅，且将自己的人生失意汇融于其中，丰富了恋情词的情感内涵。

在周邦彦大晟府门后，还有万俟咏、晁端礼、田为、徐伸、晁冲之、江汉、姚公立等人，因风格相近，后世便以“大晟词派”指称，在北宋后期主领词坛。但他们的词创作，多风花雪月，离别相思，男女伤情，脂粉才情，造成不良影响。

第四阶段 南宋前期

这个时期是北宋向南宋的过渡时期，社会由和平转向战乱，1126年元月金人攻开汴京，俘获钦、徽二帝，北宋灭亡，史称“靖康之耻”。赵构在商丘登基，是为高宗，建立南宋政权，并与金人订立“和议”，偏安江南。但战火从未停歇，终于使亡国、战乱时代来临。从词史的发展来说，出现了新的变化。封建士大夫、北宋到南宋的抗金将领和南渡词人，他们空前地将词的抒情取向贴近到了急剧变化的动荡时代和社会生活现实之中，跳出个体情感世界，